

韩国政治对立为何“深入骨髓”

1月2日,韩国《韩民族日报》发表社论,称希望今年能缓和让平民和弱势群体痛苦的“阵营对立”现象。韩国《中央日报》也发文,呼吁通过社会团结来克服危机。然而不到10天后,韩国的政治对立再次激化,曾与尹锡悦争夺总统宝座的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10日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接受检方传讯。韩媒称,最大在野党党首任内接受检方传讯尚属首次。其实,韩国的政治对立可谓“深入骨髓”,普遍程度甚至超过政治严重极化的美国。近期民调显示,这种情况甚至有加剧之势。更糟糕的是,这种对立已经从政界延伸至民间,导致韩国民间情绪对立、家人互相指责、昔日老友反目成仇。1月3日,韩国世宗研究所理事长文正仁呼吁尹锡悦政府不要搞阵营对立,“应该寻求国民共识,在外交及安全政策上顾全大局”。

对立程度“超过美国”

“这是政治报复性质的调查……是司法政变。”1月10日上午,李在明在接受调查前这样说。他当天接受了大约12个小时的讯问,直至晚上10时40分左右才走出检察厅。在李在明接受调查的同时,其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在首尔地铁8号线南汉山城站的不同出口进行集会,一方高喊“停止针对性调查”,另一方则疾呼“逮捕大洞头目李在明”。在韩国检方以涉嫌贪腐罪对李在明进行调查之前,已经对其“左膀右臂”或进行起诉,或进行调查,并将共同民主党总部列入搜查范围。一些观察人士此前就担心,韩国政坛“大混战”即将上演。

韩国政界关于李在明案的角色,只是它们政治对立的外在表现之一。在互不妥协的氛围下,韩国本届执政党和在野党已经创下宪政史上数个“首次”,包括最大在野党党首在任内首次接受检方传讯,去年5月总统首次在国会一半议员缺席的情况下发表施政演说,去年10月总统首次在在野党缺席的情况下发表施政演说等。这种朝野对立局面一直延续至2023年。今年1月2日,只有一名在野党成员参加总统迎新会。共同民主党认为,总统办公室的“邀请方式”存在问题。尹锡悦在接受韩国《朝鲜日报》采访时毫不掩饰对最大在野党的反感,并暗示无意直接与该党进行沟通。

韩国的政治对立与冲突并非尹锡悦政府专属。该国媒体“Inews24”2015年曾表示,韩国的自画像就是“对立”。去年2月大选前,韩国媒体《金融新闻》发表题为《令人羞愧的分裂政治》一文,称韩国历届总统都未能实现团结。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曾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希望看到通过对话和妥协来解决问题的政治文化。然而近20年过去了,韩国的政治出现倒退,朝野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李明博2008年上台时承诺,将超越朝野,敞开通话大门,但第二年就发生韩国现代政治史上最悲剧性的事件——卢武铉在接受检察机关调查后自杀身亡。朴槿惠在2013年的就职演说中根本没有提到“团结”,还省略了与在野党协同治理等表态。文在寅2017年就职时虽然强调国民团结,但他在卸任前承认,韩国政治未能走向团结。

一些民调显示,韩国的政治对立程度甚至超过美国。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春季对包括韩美日在内的19个国家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韩国人和美国人最有可能认为他们国家存在强烈的党派冲突。韩国90%的成年人表示,支持不同政党者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其中约一半(49%)的人表示这些冲突非常严重。相较之下,美国只有88%的成年人认为支持不同政党者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其中41%的人认为这些冲突非常严重。该机构2021年10月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也显示,在17个发达国家中,韩国与美国在政治对立方面“并驾齐驱”。2021年6月,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对28个国家进行调查,韩国在不同人群政治对立普遍程度方面名列榜首。2019年韩国地方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韩国人认为政治归属是最严重的社会冲突根源,高于阶级、性别、种族和财富。

不同阵营经常搞“集会对决”

韩国的政治对立有加剧之势。今年1月1日《韩民族日报》公布的新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韩国受访者认为,与过去相比,政党、选民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有所增加。



根据韩国《朝鲜日报》的新年特别民意调查,超四成韩国人表示不会与政治倾向不同的人一起吃饭或喝酒,约半数20多岁的年轻人表示难以与支持不同政党的人结婚。民调之外,韩国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每逢周末,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的支持者分别聚集在光化门广场和龙山总统府附近展开集会对决,一方高喊“尹锡悦下台”,另一方则要求“拘捕李在明”。

而韩国极端保守人士和极端进步人士会互相嫌弃,在一些活动中进行对抗。有意思的是,韩国年长者偏保守的较多。在选举时,这些人会要求子女给保守党派投票,因此一些韩国年轻人不愿公开自己支持哪个政党。

“保守的”庆尚道,“进步的”全罗道

“韩国的真正问题是政治分裂。”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教授合著的《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这样写道。韩国媒体和学者也在探寻国家为什么会存在如此严重的政治分歧。韩国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相万对记者表示,韩国的政治对立和党派林立可以追溯到朝鲜王朝的朋党政治。此外,在日本投降而大韩民国政府尚未建立期间,韩国各政治派别就因政治理念分歧相互斗争。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些韩国政客为在选举中获胜,利用南北间的理念性问题来争取选票。

《韩国先驱报》认为,韩国民主化的历史还很短,因此不同派别的政治人士还不习惯通过对话来协调意见,而倾向将问题描述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此外,不同代际人群之间也容易出现政治冲突。这是因为韩国在过去一个世纪内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被日本殖民到朝鲜战争爆发,从民主化、工业化再到数字化,现在的韩国人可以分为四个政治世代,他们在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环

境下成长,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很不相同。老年一代可能对韩国被殖民时期和朝鲜战争记忆犹新,认为前总统朴正熙重建了国家。中年一代则会从独裁角度看朴正熙,他们中很多人还曾参加抗议前总统全斗焕的运动。年轻一代则更支持进步派,但许多年轻人也把选票投给保守派。

还有分析人士指出,地域问题也是韩国政治对立的原因之一。韩国光复后,尤其是朴正熙执政以来,很多总统出身庆尚道,这里逐渐成为保守势力的大本营。位于全罗道的光州市发生了韩国历史上著名的“五一八民主化运动”,进步势力在该地一直占有压倒性优势。地域对立和政治倾向对立相结合,进一步激化韩国的政治对立。

政党斗争更是加剧韩国政治对立的重要因素。韩国保守和进步两大阵营通常轮流掌权。一方胜利后,总想把另一方“赶尽杀绝”。这一方面是为自己人谋取政治资源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长期执政并保证自己的安全,防止对方上台秋后算账。这种零和博弈模式扩大了社会分裂和政治对立,使原本就存在的地域对立、代际对立和左右对立更加严重。社交媒体平台也在不断加深韩国的政治裂痕,并使其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加严重。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竺志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的政治对立具有历史的延续性、现实的复杂性和域外影响的综合性等特点,既涉及韩国的国家治理、政治结构、战略选择,又涉及经济、社会、国民情感等问题。这一问题自第六共和国(韩国从1988年2月卢泰愚出任总统到现在政府与历史时期)以来就一直存在,且保守和进步阵营的支持层相对稳定,分布在不同区域,对立的基础可谓泾渭分明。李相万表示,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韩

国各年龄段人群、各地区、各阶层民众进一步分裂,媒体也分裂,形成目前保守派和进步派的既得利益圈层,使韩国政治陷入持续对立的困境,并对年轻一代产生巨大影响。

新年已至,谈论“希望”的人并不多

根据《韩民族日报》的新年民调结果,对于“加剧政党之间对立矛盾的主要政治行为者中谁的责任更大”这一问题,认为是总统和共同民主党的受访者分别占38.4%和34.7%。超过58%的受访者认为“在民主等多个方面,韩国社会正在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韩国《中央日报》称,不同阵营间爆发尖锐“攻防战”,侮辱性言辞大行其道。政界只顾看极端支持群体的脸色,忙于进一步激化矛盾。在韩国互联网上,还有人批评该国朝野展开“低级的政治对立”,称朝野在一些琐事上也互不相让,露骨地扯对方后腿。

“虽然2023年已经到来,但谈论‘希望’的人并不多”,《韩民族日报》称,韩国政界的对立激化,给平民和弱势群体带来巨大痛苦。文章举例说,韩国造船业转包劳动者要求恢复被削减的工资,但政府、执政党和企业却对他们提出损害赔偿诉讼。货物运输劳动者要求扩大实施安全运费制,但政府却对他们下达开工令,还给他们贴上“既得利益群体”的标签。少数群体和市民绝食要求制定“禁止歧视法”,残疾人在地铁上高喊“残疾人权利预算”。对于这些,政府都没有作出回应。

李相万表示,对一些韩国政客来说,如果不能在选举中获胜,就会失去一切,因此他们对解决实际问题不上心,更热衷于维护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为吸引选民,在选举中滥开“空头支票”、当选后不履行承诺的情况比比皆是,因此只要韩国的政治现状不改变,人口问题、国家发展和未来就都是无解难题。还有评论人士直言,虽然韩国朝野政党都争先恐后地标榜自己是“民生政党”,大谈民生问题,但在很多民众看来,它们都只是装作“关心”而已,因为比起那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借机掌握政局主导权才是一些政客的目的。

竺志刚对记者表示,由于韩国经济的外向型特点,韩国国内的政治对立、社会撕裂也会不自觉地投射到外交政策上,包括处理双边与多边关系的诉求和方式。此外,韩国社会对宪法赋予的国家统一的认知以及对现阶段半岛局势的看法也存在巨大的阶层差异。尹锡悦政府联合美日增强军备以对朝鲜施压的做法,虽然引来一些保守派人士的喝彩,但也引发改革阵营的担忧和民意反弹。竺志刚强调,韩国国内政治不可避免地要与外交进行一定的互动乃至刻意的联动,有时甚至会多少绑架外交,一些政治人士也会通过矛盾外引的方式来提升国内支持率,因此对一些事件可能作出过激反应。

本报综合消息

疫情后补偿性享受

美国男子一天内光顾18家米其林餐厅

美国男子埃里克·芬克尔斯坦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搬回纽约,遗憾先前未能尽情享受当地顶级美食。搬回纽约后,他一天内到当地18家高级餐厅用餐,创下24小时内光顾最多家米其林餐厅的世界纪录。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日报道,34岁的芬克尔斯坦是一名医疗信息技术顾问,去年10月完成这项挑战,去年12月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24小时内最多家米其林餐厅就餐的人。

芬克尔斯坦常年居住在美国纽约市。他生活节俭,外出用餐通常只去快餐店。新冠疫情暴发后,芬克尔斯坦暂时搬离纽约,并在那时意识到自己多年来错过了享用纽约顶级美食的机会。芬

克尔斯坦2021年搬回纽约。这期间,他听说了在一天内光顾最多家米其林餐厅的世界纪录,有心挑战该纪录。

芬克尔斯坦的策划耗时14个月,因为不少米其林餐厅即使提前很长时间也难以预约到座位。他说,这是全程最困难的部分,说服这些餐厅参与已经很难,还要合理安排路线才能在一天内完成。

芬克尔斯坦最初联系了纽约逾80家高级餐厅,只收到10家餐厅回复。开始挑战的20天前,4家联系好的餐厅失去了米其林资格。芬克尔斯坦慌乱联系其他餐厅,最终确定到18家米其林餐厅就餐。

去年10月26日,芬克尔斯坦正式开始挑战,先到纽约中城绿洲餐厅享用了

36美元的烤牛油果沙拉,再到“俄罗斯鱼子酱”餐厅享用25美元的俄罗斯薄煎饼配鱼子酱和酸奶油。他当天还在其他米其林餐厅享用了24美元的牛排、26美元的生蚝等美食。最后,芬克尔斯坦在纽约上东区Noda餐厅享用了海胆和鱼子酱点缀的蒸蛋羹,结束了一天的美食之旅。消费额总计494美元(不含小费和税费)。

他说:“我撑得够呛,挑战进行到三分之二时我开始感觉有些吃不动了。第二天,我几乎什么都没吃。”

芬克尔斯坦估计,当天的美食体验共耗费11个小时,摄入了约5000卡路里。

新华社特稿